

The Coming of Postmodernity

后理论 时代的 来临

宋伟 著

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批评理论重构

The Coming of Post-theory Era

后理论 时代的 来临

宋伟 著

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批评理论重构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宋伟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39 - 4646 - 2

I. ①后… II. ①宋…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中国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4394 号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著 者 宋 伟

责任编辑 刘晋飞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责任印制 连 睿

装帧设计 朱倩倩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6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646 - 2

定 价 32.00 元

后理论时代的批评理论如何可能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曾被体验为一场危机，需要用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那些已被人们认识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就此而言，理论话语可以解读为对历史危机所作出的反应，对动荡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反应，以及对由先前稳定或熟悉的生活和思维模式的解体而引发的社会 and 知识骚乱的反应。新理论和新观念阐述了新的社会经验。因而，新兴话语的激增意味着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变。

——贝斯特、凯尔纳

它们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是理论之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克服对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文学理论的目标愈高尚，方法愈完美，它就愈加变得不可能。

——保罗·德曼

在全球化迅速扩张蔓延的今天，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已经无可选择地被置身于“后”时代之中。“后”（post-）这一极具前沿色彩的前缀，不失时机地附着在一些概念的前面，发动了对词语偷袭，置换颠覆词语的传统意义：后现代（post-modern）、后形而上学（post-metaphysics）、后哲学文化（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后革命（post-revolution）、后极权（post-totalitarian）、后历史（post-history）、后发展（post-development）等等，几乎所有重要的概念都无法逃脱“后”的偷袭置换。从理论方面看，人们的思想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言说方式也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型或变化，或许，可以同样将其指称为

“后理论”（post theory）。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指称标示着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理论时代”。因此，当代批评理论（criticism）、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重估的问题，也可以表述或理解为“后理论时代”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

当人们用“后理论时代”来指称当代的理论状况时，大致包含有如下几层意思：一是指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二是指与传统理论不同或异质的当代理论；三是指后现代性的理论。当然，这三个层面相互交织渗透在一起，无法离析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但无论我们从那个层面来理解“后理论时代”这一概念，毫无疑问，它已经明确地表明，“理论”在当今时代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同时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这就要求理论自身不断地去追求变革与转型，以获得面对急剧变化时代的阐释能力与批判向度。

2003年，在国际人文学科领域影响广泛的美国理论杂志《批评探索》，汇集不同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以当代理论危机为主要议题，展开了一次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具体议题是：理论的辉煌时期是否已成为过去？理论是否已丧失了其革命可能性的意识？在压倒一切的大众文化和商业娱乐的大潮中文学和美学的命运如何？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是否在为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理论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以及知识传播的媒介和形式是否会给理论带来新的变化等等。^①同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出版了《理论之后》一书，同样就当代理论危机的议题进行了阐释分析，对结构主义以来的、以“文化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理论状况，表示担忧并给予了批判。伊格尔顿强调指出，“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因为我们不可能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②虽然，在这一系列关于理论危机的论争探索中，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相异的观点，但对于理论危机这一议题的基本共识是：一方面，表明理论必须面对时代发展变化的挑战，在时代的转型变革中寻求自身的转向；另一方面，表明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理论不仅不会变得无足轻重，以至于最后走向终结或死亡，反而会越发凸显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正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讨论中所言：“理论的活力一贯是追求新的东西，如果不是一种对进步的信念，至少也

① 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②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

是一种信心，即认为总会有某种新的东西来替换已经被理论经典吸收和归化的、比较沉旧的、具体的或署名的各种各样的理论。”^①

虽然，后现代在当代中国还是一个存有广泛争议的话题，在此，我们依然倾向于将“后理论时代”理解为后现代视域中的理论状况。其理由在于，“后现代”无疑是诸多“后”之中最具代表性、涵盖性的指称概念，它可以而且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当今时代的总体特征。因此，后现代在表征当今时代总体特征的同时，亦同样表征着“后”时代文化范式、思想范式和理论范式的总体特征。正如以研究后现代理论而著称的美国学者贝斯特（Steven Best）和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位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和基本上是未知的领地。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②据此，我们可以将“后理论”指证为后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毫无疑问，后现代性理论范式与现代性理论范式有着完全不同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在此，我们暂且不去疏理诸多“后现代”概念的复杂歧义。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在“后”时代，理论将成为一种何样的理论？如果理论一词也前缀上一个“后”字，那么，“后理论”将会是一种何样的理论？与之相应，“后理论时代”的批评理论或文学理论重构又将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理论视域？

今天，我们已经无可选择地被置身于“后”时代之中。“后理论时代”的批评理论或文学理论的重构或重写之所以被反复不断地提出，是对当代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一种回应。正是由于，我们所处时代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语境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关于“后理论时代”批评理论或文学理论重构或重写的议题，显然应该建基于整个时代理论范式或思想范式转型变革的大背景之中来展开。因此，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整个时代理论范式的转型变动，如何测绘当代文化地图的思想形貌，如何理解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走势，对于后时代批评理论或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前提性理论工作。

从八十年代开始至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构或重写的意动和构想一直作为理

① 詹姆逊：《理论的征状还是理论的征兆》，参见王晓群主编：《理论的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②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论研究领域持续绵延的热点题域。这种诉求本身表明，人们对以往理论的叙事体系存有普遍的不满和多方质疑。同时，也表明当代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范式正在或已经发生着重大的嬗变与转换。然而，如何把握和理解这一嬗变与转换的真实内容，选择怎样的思维方式或理论范式来完成理论时代批评理论的重构重写，却是长期以来这一题域里模糊含混的样态。此种样态，造成多年来一些重构重写的作业并未有效地完成。所谓的重构重写往往成为新史料、新作品、新术语、新形式的添加、增补与组合。这种重构重写的文学理论表面上似乎也会给人一种“新”的印象，但这种“新”不过是表面上的翻新而已。重构重写之所以会变成表面的翻新，其缘由在于依然囿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之中。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依然只能是一种传统的叙事，一种似是而非的创新。如此看来，要想有效地完成当代批评理论的重新建构、重新书写或重新叙事，就需要对传统叙事方式进行一番批判性的反思与清洗，而传统叙事方式基建在传统思维方式与理论范式的基地之上。因此，对传统叙事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就与对传统思维方式、理论范式的批判性反思紧密地牵连在一起。

何谓理论？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追溯“理论”（theory）一词的原初意义时指出，理论的意义并不是为世界提供所谓实证的规范的科学基础，理论是我们切近事物或事件并邀请其出场的一种实践方式。伽达默尔说：“‘理论’一词的希腊文是 *theoria*，它表现出人的存在这种宇宙间脆弱的和从属的现象的明晰性：尽管在范围上微弱有限，他仍然能够纯理论地思考宇宙。但是根据希腊人的观点，构造理论恐怕是不可能的。那样说象是我们制造了理论。理论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像根据建立于自我意识之上的理论结构的那种优越地位所意指的，指与存在物的距离，那种距离使得存在事物可以以一种无偏见的方式被认知，由此使之处于一种无名的支配下。与理论特有的这种距离相反，理论的距离指的是切近性和亲缘性。*Theoria* 一词的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那种崇奉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对这种神圣活动的观察，不只是不介入地确证某种中立的事务状态，或者观看某种壮丽的表演或节目；更确切地说，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①在西方的知识传统或理论传统中，不管对理论的性质和使命有怎样不同的看法，但大都把理论作为关于世界的权威性、指导性、规范性、概括性的解释

①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或理解，即合理合法性的解释或理解。理论的科学性、实证性、抽象性使理论成了远离生活实践的空中楼阁，理论使理论家从生活事件之中抽身出来，成为感性生活世界的遮蔽，从而遗忘了理论吁请存在出场，切身性地进入生活事件的原初本义。

从哲学层面上看理论，传统理论形态或传统知识形态的共同哲学根基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在传统理论观念中，实体本体论（substance ontology）的形而上学理论思维是最难祛除的传统理论范式。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本体论哲学一直被认定为“最高的知识”，被认定为一切理论知识的基础和前提，本体论（ontology）哲学因此亦被称之为“元哲学”（meta-philosophy）、“元理论”（meta-theory）或“元知识”（meta-knowledge）。后现代哲学转向以更加激烈、更加极端的姿态和策略，发动了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彻底颠覆和摧毁。利奥塔正是在此意义上，以对“元话语”（meta-discourse）、“元叙事”（meta-narrative）或“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质疑来标示出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眼里，哲学中的本体论必然产生总体性，而总体性乃是一种同化他者、吞噬个性、取消差异的暴力体系。因此，“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乃是一种强权的哲学，一种中性的哲学，一种作为无名的非人的普遍性之状态的暴君。”^① 列维纳斯向总体性开战，即是对强权本体论的抵抗，即是向暴力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暴力的挑战。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其谱系学、考古学方法，揭示知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隐秘共谋关系，并从人的有限经验的限定性出发，宣布了无限之形而上学的终结，宣布了人之形而上学的死亡。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进行不懈的猛烈攻击。以“不在场”（absence）颠覆“在场”（presence），以“边缘”（periphery）颠覆“中心”（center），采取“延异”（différance）的文本策略破解任何本体论的确立和形而上学的建构。此外，后现代哲学所谓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反宏大叙事（anti-grand narrations）等主张都可以视之为反本体论形而上学的不同表述。

虽然，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颠覆摧毁已呈崩解之势，但本体论理论思维的幽灵依然在不知不觉中作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已构成理论思维中挥之不去的怪影，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积淀了两千多年历史的理论思维模式。由此，

^① 参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5页。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何以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时才逐渐呈现出崩解的真实内容，也可以理解一个多世纪以来诸多哲学转向从不同方位对其发动的全面围攻。表面上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形而上学颠覆和拆解，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实质已经很容易被识破和揭穿，但是，本体论理论思维模式却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可以破除。在现今流行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体系中，本体论思维依然或隐或显地成为主导性的幽灵，以至于在许多人眼里，离开了本体论，离开了本体论思维，理论的思考和建构几乎就无法进行。当代文学理论多是以文学或审美的本体、本质、规律的追问，作为最基本的元理论起点，虽然，有些文学理论著述已经意识到本体论思维的局限，并试图用文学创造、审美活动、审美实践创造等概念取代本体论或本质论的提问方式和思考方式，但由于没能彻底摆脱掉本体论思维方式，依然会导致将文学创造、审美活动、审美实践、艺术生产等概念本体论化的倾向。在这种本体论思维作祟的理论模式中，本体论或本质论的理论观念始终统摄文艺理论的重构重写，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始终成为贯穿理论建构的内在理论神话。因此，只有破解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只有清洗掉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批评理论的重构重写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展开。

从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层面上看理论，当代文化思想对形而上学的理性清洗，动摇了启蒙理性的信念，理论乃至科学的理性根基和确定性基础露出了破绽，从而对传统理论或传统知识地位的合法性发出了质疑。现代性在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理性法庭的建立完成了神话与宗教的祛魅（disenchantment）。现代性确立自身合法化合理化的过程，是通过理性的系统化、体系化——即理性的理论化、知识化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另一个别名。理论的生产以及理论权威性的确立，是现代性合法化合理化的内在知识性诉求。因此，后现代性理论范式在颠覆摧毁现代性的过程中，势必要颠覆摧毁传统理论或传统知识的权威合法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后现代理论是一种反理论（anti-theory）或非理论（non-theory）的理论。反理论或非理论的后现代理论范式对系统化、体系化、实证化、知识化的传统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质疑。后现代性理论话语彻底地揭穿了理论身上披挂的科学权威性伪装，指出理论或知识话语背后隐藏着与某种权力相互共谋的关系。以往诸种理论建构的基础性构件，诸如本质、概念、逻辑、体系等都被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拆解为支离破碎的碎片。在后现代理论看来，本质主义即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谵妄是理论所固有的顽症。具有形而上学谵妄症的理论

最终必将导致恐怖、暴力和死亡。所谓概念的先验自明性（transcendental self-evidence）即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自我镜像，一旦将其还原为语言问题，这些先验自明的概念所指涉的命题都不过是一些假命题，这些概念的言说都不过是一些滑动于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语言游戏。体系的建构是理论的内在要求，然而，体系建构的种种设想和冲动，都不过是某种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乌托邦幻象。总之，在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拆解颠覆下，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已变成一种可以分离解构的片断；指涉实在的理论概念已变成一种话语方式；因果关联的理论逻辑已变成一种延异的隐喻。在后时代，在后现代，所有的理论都已成为一种反理论或非理论，成为一种后理论（post-theory）。

至此，后现代时期的批评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变成了在反理论、非理论或后理论的时代，批评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反理论、非理论或后理论的时代去重构理论，这确是一个充满悖论的问题，同时它也意味着这是一个难解甚或是无解的问题。然而，我们无法回避地要进入这个充满悖论的怪圈。因为，在后时代，在后现代文化范式业已形成的今天，试图在传统理论的框架内建构一种新理论的追求已经成为不可能的谵妄。也就是说，囿限于传统理论本身来探索如何重构或重写文艺理论的思维进路，最后只能流于修残补缺式的理论改良。它不仅无法有效地完成后理论时代文艺理论重构或重写的作业，反而会遮蔽这一问题提出的真实背景。

后理论时代批评理论重构重写的前提性工作，首先是传统理论观念的批判反思。我们看到，由于缺乏对传统理论观念的前提性批判反思，一些新的理论建构尽管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改写，其结果依然是旧瓶装新酒式的工作模式，依然难以突破传统理论的阈限。传统的理论神话依然成为理论创新难以逾越的障碍。这里所说的传统的理论神话具体表现为：体系的神话、概念的神话和逻辑的神话。体系的神话表现为对建构体系的崇信；概念的神话表现为对基本概念偏执；逻辑的神话表现为对逻辑演绎的痴迷。只要理论依然束缚在这些理论的神话之中，所谓新理论的重构重写，终究跳不出传统理论的如来掌心。理论的神话一经破解，传统的理论观念经过前提性的批判反思，新的理论形态才有可能逐渐浮出水面，并呈现出特有的谱系征相。显然，这一新的理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甚至用“理论”一词来表述它已有点不太适合，因为它是一种非理论的理论，一种反理论的理论，一种后理论的理论。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加塔利（Felix Guattari）将这种后理论状况描述为绵延起伏、重峦叠嶂的千座高原。在

他们看来，千座高原上的游牧式思维作为抵抗条块界划清晰的“辖域化”（territorialize）传统理论思维，意味着自由解放的多样可能性。他们用“树状的”（arborescent）来隐喻传统思维模式；用“块茎状的”（rhizome）来隐喻后理论思维。“‘树状思维模式’指那种形构了植物学、信息科学、神学等所有西方思想的认识论。……认为心灵按照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枝）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由镜子所提供的），而这些知识都扎根于坚实的基础（根）之上。这些隐喻使得树状文化建立起了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概念结构。……与树状思维不同，块茎思维试图将哲学之树及其第一原则连根拔起，以此来解构二元逻辑。它试图铲除根和基础，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与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性，制造出新的连接。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的、非二元对立的。”^①对于后理论来说，如果还要有体系，这种新理论的体系应该是一种非体系的体系，这意味着它应该是开放的、流动的、茎块状的，而不再是封闭的、凝固的、树状的；如果还要有概念，这种新理论的概念应该是一种非概念的概念，这意味着它是差异的、非透明的、隐喻性的、块茎状的，而不再是同一的、透明的、确定性的；如果还要有逻辑，这种理论的逻辑应该是一种非逻辑的逻辑，这意味着它是断裂的、延异的、非线性的，而不是连续的、历时的、线性的。反理论、非理论或后理论与传统的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范式。其主要表现为传统理论是本质论或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理论，而后理论则应该是反本质论、反本体论的后现代性理论；传统理论是本质或规律的一元决定论，而后理论则应该是文本话语与解读叙事的多元差异论；传统理论是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精英文化研究，而后理论则应该是以大众文化为对象的文化研究。

也许会有人说，如此反理论、非理论的后理论是不是过于怪异？也许会有人会提出，如果理论不追问本质本体，不揭示规律性、同一性和普遍性，那它还是理论吗？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抵制理论》一文中回应了这些怀疑、抵制和反对的声音，并阐述了这种反理论或非理论的理论所应该具有的谱系征相：“文学理论的什么东西这么吓人，以至于激起如此强烈的抵制和攻击？它由于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运转机制，而倾覆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反对美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

①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29页

分的强大哲学传统；它瓦解了文学作品既定的经典，模糊了文学和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界限。”德曼认为这种充满悖论的文学理论，正因其悖论的充满而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们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是理论之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克服对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文学理论的目标愈高尚，方法愈完美，它就愈加变得不可能。然而，文学理论并没有沉没的危险；它不由自己的兴盛起来，而且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是兴盛，因为它讲说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不过这种兴盛是一种胜利抑或是一种失败，却仍然无法做出定论。”^①在反理论、非理论的后理论时代去建立理论；在后时代、后现代的文化范式中，去重构后理论的批评理论，将会是一种成功抑或是一种失败，或许正如保罗·德曼所说的那样，我们依然无法做出定论。

^①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第114页。

1	导 言 后理论时代的批评理论如何可能
1	第一章 现代性终结： 从现代性危机到现代性批判
2	一、现代性的多副面孔
9	二、现代性谱系与历史时间
14	三、哲学事件与事件哲学
25	四、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阈中的当代美学
34	第二章 后现代理论： 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
35	一、后现代范式与后形而上学思想
41	二、工具理性神话与知性思维的消解
44	三、形而上学谵妄与本体思维的解构
50	第三章 启蒙的神话： 从理性建构到理性崩溃
51	一、理性的奠基
54	二、理性的确立
64	三、理性的吊诡
70	四、理性的崩溃
78	五、艺术化返魅
89	第四章 主体性黄昏： 从大写的人到生存的人
90	一、当代哲学转向与主体性哲学终结
97	二、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
101	三、镜像自我与语言建构的主体
104	四、生存困境与人的无限敞开性
111	第五章 生存论美学： 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
112	一、存在的遗忘及其克服： 进入诗意栖居的澄明之境
128	二、人的异化及其克服： 从劳动实践到审美实践
144	第六章 实践存在论： 从实践论美学到存在论美学
145	一、苏联模式： 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

151	二、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161	三、后形而上学的境域融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169	第七章 语言学转向：从对象性到非对象性的诗性道说
169	一、拒斥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
174	二、言说不可言说的诗性语言观
182	第八章 文化工业：从文化生产到文化批判
183	一、批判理论视阈中的大众文化研究
193	二、文化生产与传媒文化政治
203	三、资本逻辑、消费社会与艺术商品化
213	第九章 视觉文化：从摄影作为艺术到艺术作为摄影
214	一、凝视帝国中的形而上学
220	二、从摄影作为艺术到艺术作为摄影
237	三、机械复制时代的视觉文化
261	四、绘画的本源性与艺术现象学
272	第十章 景观社会：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273	一、都市景观的物化与异化
278	二、都市景观的欲望化解码
291	三、都市景观中的放浪美学
295	四、娱乐狂欢与笑的文化精神
301	第十一章 空间转向：从时间与存在到空间与存在
302	一、空间转向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309	二、空间生产与空间表征
319	三、空间转向与身体转向
327	四、空间转向与文学理论范式的当代转换
335	后 记

现代性终结： 从现代性危机到现代性批判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奥斯威辛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奥斯威辛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力，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奥斯威辛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

——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

——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一个总问题域中难以分割的两个方面。作为问题意识与危机意识的现代问题，只有站在后现代性的立场上进行反观式的反思批判，才有可能得以展开和完成。这一立场同时表明，后现代性是现代性诸种危机的病理诊断与解构批判，是现代性断裂和终结的产物。因而，离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无法理解后现代性的颠覆批判精神，同样，离开后现代性的批判维度，也就无从谈起现代性的问题。从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后现代转向是一种对抗性的断裂，是一种颠覆性的批判，是一种文化思想范式的革命。正是由于解构批判的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兴起，使“现代”真正成为一个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是现代性危机意识的表征，要真正理解其表征危机的种种意义，就必须跳出现代性的陷阱，在现代性的断裂处，在现代性的脱域处，即站在后现代性的立场上反观现代性，以完成对现代性的诊断与

解构、颠覆与批判。后现代性即是对现代性的诊断与解构、颠覆与批判。因此，应该从后现代性视阈出发，站在后现代的维度和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质疑与批判，并对审美现代性的问题给予重新的描述与审视，以发掘其中所蕴藏的后现代性的质疑批判精神。

一、现代性的多副面孔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现代性问题业已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热点题域。然而，何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是否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如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冲突，究竟表明现代性依然具有自我调理和修复的功能，还是其已经进入终结阶段的征兆？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更由于后现代思想的兴起，使这一题域的诸多问题变得越发纷繁复杂、诡异难辨：“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世界”（modern world）、“现代主义”（modernism）、“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等概念，构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语义星丛。现代性这个复杂歧义的概念，“正像它所表示的既复杂又矛盾的现实一样，一直不明不白。”^①难怪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词源学考查的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今天依然认为现代性是个看起来简单却又无比令人困惑的问题。卡林内斯库说：“什么是现代性？就像其他一些与时间有关的概念一样，我们认为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一旦我们试图表达自己的想法，就会意识到，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需要时间——更多更多的时间。”^②有感于此，法国著名现代性理论家伊夫·瓦岱（Yves Vadé）用“杂音异符的混合体”来形容现代性题域所呈现的复杂局面：“1984年，《图书天地》推出一组具有明显消极意义的专题报道，题目是《难以捉摸的现代性》。一位哲学家在报道中宣称，这个概念‘令人讨厌，且空洞无物……它与哲学没有多大关系，哲学问题……是超越时间的，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一

①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位文学评论家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它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并且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假如我们想属于今天，我们就不再属于现代。’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现代性‘究竟是进步意识形态的后代……它受到祖宗的吞噬，遭到时尚效应经验主义的侵蚀，最后变得面目全非’。就这样埋葬掉现代性这个概念未免有些草率，在此后的年代之中，有关这个术语的讨论和出版物之多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但与此同时，‘现代性’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出格，这不但涉及历史、美学、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波及经济、政治和广告领域，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①面对现代性题域所构成的复杂语义星丛，面对现代性所具有的诸多副面孔甚或诸多副假面具，要辨识其真实面目，并企望给出一个清晰的认知图绘，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客观静止的认识客体，它是一个复杂歧义的星丛，是一个家族相似或相异的谱系，是一个带着多副假面具的多副面孔，是一个充满悖论背反的多重变体。在当代诸多的现代性论域中，有社会的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自反的现代性；有流动的现代性、坚固的现代性、可选择的现代性；有终结的现代性、未竟的现代性；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再加之现代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割纠缠，以及全球化背景中现代性、民族性与地方性的冲突，现代性题域变得更加纷纭繁复。明确现代性是一个难以明晰把握的问题域，暗含着对现代性研究的认识论预设前提的质疑。它至少表明，面对这种复杂歧义的题域，企望运用“符合认识论”方法对之施以认知图绘的测量，其有效性和可能性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前提。因为，对现代性的解释只能是一个难以完成的解释，对现代性的识别只能是一个模糊多面的识别。然而，我们却不得不进入现代性这一解释的循环之中，我们却不得不进行这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完成的作业。这确乎是一个悖论，我们已置身于现代性场域之中，因此，我们无法回避或逃离这悖论境遇的缠绕。站在充满悖论的解释背景中，或许可以找到比较恰当的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视角与方法。至少，它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那种认定可以给现代性问题一个明晰认知图绘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可疑或错误的预设。

据西方学者考证，大约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形容词“modernus”一词，“现代”（modern）一词以拉丁词“modo”为词根，本义是“现在、此刻、刚才和

^①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